

同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丛

丛书主编 周家伦



全球化语境下的儒学价值与现代践行

◎ 邵龙宝 著



NLIC 2970698776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同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丛

丛书主编 周家伦



全球化语境下的儒学价值与现代践行

◎ 邵龙宝 著



NLIC 2970698776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语境下的儒学价值与现代践行/邵龙宝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608-4483-1

I. ①全… II. ①邵… III. ①儒学—研究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1910 号

同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丛

全球化语境下的儒学价值与现代践行

邵龙宝 著

责任编辑 刘 芳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陈益平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22.25

印 数 1—1500

字 数 445000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4483-1

定 价 42.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同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丛

主 编 周家伦

副主编 丁晓强 李占才 端木怡雯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晓强 王 滨 仇华飞 李占才 李 渡 邵龙宝
张 劲 周家伦 周敏凯 章仁彪 端木怡雯

作者简介

邵龙宝,1951年2月23日生,上海市人。

1978年毕业于延边大学中文系,1994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法学硕士。现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上海市伦理学会理事,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会理事。曾任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哲学系副主任,伦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现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委员会副主席,教学委员会副主任,比较文化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思想政治教研部主任。曾主持完成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基金一般项目2项,教育部重点项目和上海市德育重大项目多项,现在研项目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中西文化传统的人格理论比较研究》,出版专著(合著、主编和教材)7部,发表论文100余篇。



总 序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强有力地领导、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发展,同时不断地总结自己实践的经验教训,汲取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发掘和提升广大民众的创造精神和创新成果,从而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高等院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教育为本,德育为先。教书育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化、信息化高速发展,多元文化渗透、影响加剧的背景下,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卓有成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升全民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探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自觉性和自为能力。

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增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同济大学当年获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博士点授权、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授权,学校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强有力支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不仅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为其成果提供展示舞台,更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积极参与。几年来,该学科的学术骨干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根据学术骨干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已有研究的成果、研究课题,我们决定以文集、著作形式编辑出版《同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丛》。出版该研究论丛,既是对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检阅,也是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鞭策。希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队伍再接再厉,更深入、更务实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水平,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周家临

2009年7月

自序

在这部著作中凝聚了我近十年来对儒学传统如何进行现代转换的思考。本书包括上中下三个部分,上篇阐发了儒学传统的基本精神,突出在历史研究的梳理中对其精华和糟粕作双向诠释;中篇是将儒学放置在全球交融的世界背景中进行比较,以彰显其世界意义;下篇试图回答在全球化背景中如何回归、转换和创新儒学传统,以实现在可操作层面进行普及和现代践行。本书中绝大多数篇章都曾在《文史哲》、《学术界》、《道德与文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同济大学学报》等刊物和《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上以论文和调查报告的形式发表或转载过,有一篇章是我在2008年11月作为首席专家申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项目论证过程中写就的。多年来萦绕脑际的问题是:儒学传统究竟是怎样产生对当下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影响力的,在与西方文化传统的比较中儒学究竟居于何种地位、充当了什么角色,具有什么价值?儒学传统作为资源价值以外是否还有动力效应?如何对儒学价值进行创造性转换,儒学的现代践行之途和普及之路究竟在哪里?

孔子是儒学的集大成者,不是儒学的创造者。“儒”在孔子之前被称为为人相礼和丧葬的“小人儒”,在孔子那里才由“小人儒”演化为“君子儒”。儒的名号与儒者早在春秋之前已经存在,作为一种学说和思想体系则是产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儒家学派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小农自然经济和宗法等级制度。一般人们把儒学分为先秦儒学、宋明儒学和现代新儒家三个时期。这种分期法缺少了一个汉唐儒学,再者,现代新儒家中又可分为一代二代三代说,与现在大陆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研究儒学的诸多学者的界线怎么区分?总觉得比较含混。我比较赞成“五期说”:第一期是孔子、孟子和荀子;第二期是汉儒;第三期是朱熹、王阳明;第四期是现代新儒家;第五期是现在活跃在海外、港澳台和大陆(包括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研究儒学的学者们。第四期有熊十力、牟宗三等人,第五期的代表人物比较复杂,可以有不同的说法。儒学的发展流变有自己的形态,但总是在道佛互动中演化,及至近代以降,更与西方的各种思想流派、马克思主义展开对话交流,儒学必须要在对它者吸取和借鉴的基础上才能有新的生命活力。儒学的发展创新离不开社会存在,即活生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生活方式的变革。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和

生活方式的变革总要受到全球化时代的制约。儒学是人学,它从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出发,关心人的生存状态、人类的命运和人性的建设,它关心人活着时的境况,不太关心人死后的情形。它对人为何活,活的怎样探究得尤其深入。它不光谈“心性”、信仰、内在超越,也谈政治、经济、“庶之富之”、经世治国的方略和国策。

人类文化正进入到第三次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第一次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即在公元前2世纪到8世纪之间,在古希腊、中国、印度和埃及等地几乎是同时产生了苏格拉底、孔子、耶稣、释迦牟尼等思想范式的缔造者和哲人先知,他们所创造的思想至今仍然是世界各国、各个民族的人们日常生活、行为规范和行动的指导原则。人类第二次文化复兴是文艺复兴。伴随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物质上的空前丰富和生活上的极大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日益扩展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与心理危机,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俨然以为可以替代上帝,能够解决人类自身的一切问题。现在却越来越觉察到人类自身和科技的局限性:人类在不断提升自己改造自然方面的力量和智慧的同时,并没有能够同时提升自己的人文力。现代科学技术解决不了信仰问题、价值问题和精神家园的归宿和安顿等现代性的危机问题。我们今天正面临的人类第三次文化复兴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之争,二是文化与文明的冲突,三是国家利益的矛盾。事实上文化与文明的冲突并不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大都是伴随经济、政治的利益冲突表现出来。

当今世界,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和人为物役。所有的问题,归结到一点上,就是人的问题。因而,今天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性、人道、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人的信仰、人的价值、人的本质、人的尊严、人的生命智慧等理论和现实问题越来越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命题。不可否认的是尽管现代科学科技理性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人为物役,破坏了诗意、自然、安宁和各种人间情爱,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极大地改变、改善和丰富了整个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的享受,延长了人的寿命,彻底摒弃了穴居洞处,茹毛饮血的生存困境。因而,当我们批判现代性危机和高扬传统儒学精神时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的各种生存条件的变化,承认历史的进步和传统儒学资源的局限性,不能无限夸大儒学的超越性价值,片面否定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现代文明的成果。我们所要作出的努力,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对儒学传统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资源性价值,为现代性社会生活提供精神性元素,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提炼提供母体性、民族性的家园式文化土壤条件和制度创新方面的启迪,对现代科学技术加以重新研究、了解、改革,重建它们,清除其为害于人的一面,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和谐与民众获得幸福美满的生活。

人类文化是从蒙昧走向野蛮,又由野蛮走向文明。在文化的演进中,有两种进

化机制:一是挑战应战。就自然而言是应付天灾,如地震和水灾。就人类自身而言,就是有各种原因而引发的战争。第二种文化演进的机制是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例如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形成了工业文明。那么,未来的文明或者说后工业文明怎样产生呢?富有理性的人类肯定会千方百计避免战争,选择文化在冲突、对话和交融中的综合创新。

人类文化在演进中总有一种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即主轴力。在轴心时代,主轴力是道德,这可以通过道德文化对当时和未来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来证明。但后来由权势取代了道德,“势”与“道”孰高孰低、孰优孰劣?自古以来一直被人们作出不同的评价,而在社会活生生的政治斗争的角逐中,权势总是处在道德之上。历史就是在这种强权争霸中得以前行,成王败寇是历史的一条明线索。另一条线索是德性以“道”的形而上的形式出现,她被喻为左右历史前行的“暗”规律,这是所谓理想主义者的高歌。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的魔力在全世界迅速扩展,资本不断向全球扩张,权势与财富相互勾结,财富开始取代权势,至少使财富表征着权势,权势成为财富的附属,这也是一条明线索。在中国当下,透过表层的权势和财富,知识社会正在极具生命力地影响着社会,知识社会正在孕生,它一方面由科学技术统治整个社会作表征,另一方面由制度创新来解说,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令世人惊叹的伟大成就,无一不在证明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的伟大魅力,这又是一条“暗”线索。然而,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则是一方面制度被创新出来,另一方面创新出来的制度被一种传统的负面的东西所扭曲和变形;另一方面创新制度、执行制度的人自己本身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人,有的甚至表现为双重人格或分裂性人格。还有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即整个社会相当程度上存在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偏差和误区——即对知识的理解上的分裂状况和持有分裂状态的理念,即注重知识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忽视、看轻知识的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人文理性。这种知识观和用这种知识观指导下的治理、管理和教化活动都属于知识分裂状态的治理、管理和教化,这是科学的发展观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科学的发展观之所以提出的重要依据。胡锦涛总书记最近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击中了时弊和要害。不纠正这种制度创新和制度执行中的知识观和践行观,制度的运作就不可能真正有智慧。人类历史已经历了从道德—权势—(技术)财富—制度主导的漫长的历程,现在正进入到知识主导(治理)的阶段,但是这种知识主导的知识观在相当一部分治理者和管理者的治理和管理实践中存在着分裂状态,即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目的理性的分裂状态,唯有克服这种知识的分裂状态,才能进入智慧状态的治理。唯有智慧状态的治理、管理和教化,才能解决中国社会在快步前进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包括两级分化、腐败、生态、环境和能源等危机。

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需要知识和智慧进行制度创新的阶段。从文化表征上说,我们已经不是以权力为中心,不是以金钱为中心,而是以知识为中心、智慧为中心的治理。事实可以证明,权势解决不了、金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唯有知识、智慧才能真正解决。

考察知识的分裂状态,有必要回顾西方的现代性哲学对现代性危机的回应。现代性哲学可以说就是主体性哲学。这种主体性精神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中不断得到彰显。然而,这种表现为自我绝对化趋向的主体性因其内在的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处于对立状态而使自身没有真正的独立性。主体性原则由笛卡儿的“我思”确立起来,他把知识的可靠性建立在主体理性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主体性的权威,确认现代人作为主体能够认识世界与真理,由此开启了对自我主体的反思哲学。但主体性自我将上帝推倒之后未曾料到,在征服周围一切的过程中自我膨胀起来,导致自我的分裂。康德既确立了主体自身,“同时又在与他者划界的过程中,导致了诸如信仰与知识、精神与自然等二元论”。^[1] 康德认为自我主体不仅是知性的力量,也是道德实践与审美鉴赏的先天原则和资源。“理性主体以自我的自主、自律、自由变成了整个文化领域中的绝对立法者”。^[2] 在黑格尔看来“由自我反思所充分发挥出来的精神的自由自在性与主体性,就是现代性的事业”。^[3] 黑格尔发现了主体性不仅会走向异化与分裂,也可以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辩证法。黑格尔一方面发现了这是一种人性的自觉,这种自觉体现在一切社会实践活动中,另一方面他将主体性的理性导向绝对化与偶像化的死胡同,以至于丧失了人的本性,毁掉了人自身的存在与自由。实际上,现代性的危机就是人的主体性的进步与异化共存于世界的危机。人失去了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失去了生命的活力。胡塞尔超越了笛卡儿和康德的主体哲学,提出了“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把理性批判与本体论融为一体,“放弃了形而上学所提出的自我论证的要求,而赋予现象学方法以一种本体论诠释学的意义,即用对‘此在’的生存‘显现’根据的展示方式取代了‘我思’的逻辑推论,使人作为被镶嵌在具体生活情景中的‘在世的存在’,通过自身的生存样式来开显‘存在的意义’”。^[4]

以上是对西方哲学应对现代性危机的种种思考的粗略回溯,使我们看到了重建理性的可能性。现实的状况是,这种现代性的危机正在中国大地蔓延,自近代以来,西方的启蒙理性已经成为我们的新传统,渗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新老传统的精华之联姻成为中国特色的文化意蕴,而新老传统的负面因素的勾连是造成知识的分裂状态的“元凶”。努力克服知识分裂状态,寻求使治理、管理和教化蕴含智慧的途径。应对第三次人类文化的复兴面临的种种问题,唯有综合中外思想文化资源

[1]-[4] 王振林:《现代性的哲学视域》,《光明日报》理论版,2008年12月23日。

加以综合创新一途。

在创新知识为智慧的系统工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是大有可为的,儒学是一种道德人文主义,儒释道是一种生命智慧,在 21 世纪对世界必将作出重大贡献。文化生命的强弱决定文化的存亡,民族文化毁灭就是民族生命的死亡。儒家修齐治平的实质是社会和谐,儒家重视民生,遵守正人先正己的正人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智慧,从“正德性”和“重礼乐”入手为重建人伦价值系统。儒家以孝道精神引导人们上下无怨,达到与民同乐,主张“天下情怀”和“圣王统治”,体现了中国特有的政治宗教和人文宗教的特点。儒家的政治伦理、生活伦理和教化伦理有机统一,突出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智慧。^[1] 儒家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它的生生不息的自我创新精神和“与时偕行”的品质。儒学在当代的创新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西马整合,针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问题,进行思维方式、理论体系、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可操作层面即实践层面的应用等诸方面的创新。

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个人成就三个环节中儒释道不可或缺。有的西方学者说,其实中国人不必学西洋哲学,西方哲学已经没落,概念式哲学不能解决世道人心的问题,认为西方人的方向错了——西方人是知识爆炸而智慧沉沦,中国文化重人尊生,立人于天地之间,推己及人、宽厚待人,顺天时应地理、通人和——此话失之偏颇但又不无道理。

诠释和转换儒学的现代价值有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它是针对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不能只是对文献的诠释。人们往往会向自己提问,今天的社会何以需要儒学,今日中国社会突飞猛进与儒学有什么关系吗? 儒学和现实社会生活所存在的问题又有什么关联? 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如发展不足、改革不到位的问题、环境生态问题、腐败问题,还有经济和金融方面的“虚胖”问题、劳动力贬值乃至高学历、高学位人力资源贬值的问题。还有中国社会面临着“体制性迟钝”的问题,即面对各种社会矛盾,反映迟钝、信息失真、处理失当,其缘由是体制上的和评价机制或制度的问题还是官德、官风的问题? 在我看来以上问题,即不是单纯制度上的问题,也不是价值、精神、信仰上的问题,又不是物质和生产力的问题,而是信仰和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张力的问题。

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中,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我们的阴阳协调、整体和谐、直觉顿悟、有机论的思维模式可以弥补西方的主客两分、从概念、判断、推理到庞大的形式逻辑体系和实证实验科学、机械论的思维模式。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莱布尼茨发现易图的二进制特征;瑞士心理学家荣

[1] 张瑞涛:《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10年12月28日。

格发现《易经》巫法中蕴含的同步原理与因果原理不同;法国医生申伯格在 20 世纪发现生物遗传密码表与六十四卦的对应问题。中国古代的四千多项发明创造对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正像李约瑟先生所说的,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对人类世界作出更加伟大的贡献。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的一个重大的作为,将是中国的养生哲学,政治治理理念和生命智慧,这在《黄帝内经》、《周易》、《孙子兵法》、《道德经》及儒家的《四书五经》之中深藏着宝贵的资源。这是中国人的身与心如何安顿,社会如何治理的中国式的智慧,它是整个人类面临诸种问题的一个最终解决的入口之一。人同此理,理同此心,无论什么民族和肤色的人,都有一个怎样安顿自己的身和心的问题,这是人格的问题,是气质的问题,也是性格的问题,而决定这些问题的根本理路则是人生观、价值观、人性和人文关怀、人文力等诸问题。所以本书从揭示中国儒学的基本精神切入,然后进入到儒释道之比较,进而进入到中西比较。在全球化语境下无论谈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印度哲学,不从比较下手,就好像是在一厢情愿、自说自话,没有一个参照系、一个坐标,你怎样权衡一种思想和文化的特性和优劣?而所有比较之中心点则是“人”,现实中的“人”。

或许本书的第三部分才是最具思想价值的,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的写作似乎正在参与第三次文化复兴的伟大行动。“全球化”已然脱出了话语层级而成为一个认识和分析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理论框架或参照,对儒学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就是在这个理论框架或参照中展开的。人类面临上述那么多复杂的情状,我们何以为生,如何才能创造出能够应对新的危机的思想、理念和文化?在我看来,与世界接轨的前提是认识和了解我们的传统,不仅要了解五千年的“老”传统,还要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的“新”传统,我们不仅远未搞清楚“老”传统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观念体系、信仰的内涵、伦理道德的特性和规范的“活”传统,也没有搞清楚五四以来的“新”传统(包括大传统与小传统)，“五四以来的学术传统决不是仅仅翻译和移植了西方的学术,而是一个从‘输入学理’到‘再创文明’的过程”，我们应珍视“新”、“老”文化传统这笔宝贵的资源。传统理念的现代应用、现代践行是中国人 100 多年来孜孜以求未能得到解决的大问题,自近代以来,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再只是中国学术的一部分,而是进入了世界性学术语境之中,因此,关乎儒学现代价值和践行的研究本身就具有世界性意义,因为接续上了我们的传统,就与世界接上了轨;儒学的现代价值及其践行的研究已经将东西方资源纳入到一种动态跨文化场域之中,并为创造性发展的历史条件作了准备。

诠释和转换儒家伦理应该从信仰和制度的相互依存、矛盾和张力作为接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西方文化三者对话交融中展开,必须在批判地继承和弘扬的双向展开中进行。

在诠释和转换中有一个重要的抓手,那就是着力于政治精英、企业精英和知识精英这三种人,因为他们是制度机制的主要建立者、修订者和实施者。他们的精神状态、人格境界、信仰状况实际上制约着制度机制的运作。知识精英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关系到国计民生问题向政府机关积极建言献策,都需要以传统中汲取资源。企业精英中出现的一股学习国学的热诚,虽说有附庸风雅之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强烈地渴求知识,期望从传统资源中获得养料,从而提升自己的品位和境界。政治精英越来越关注民生,尤其是高层领导更是殚精竭虑、身体力行领导建设和谐社会,注重从传统中汲取力量,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得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气派更加鲜明,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

思想的本质是切入问题的洞见,指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方案。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不以为自己是在做学问,而是在冥冥中参与今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创新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崇高事业,深感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正被卷入文化复兴的洪流中去尽一份“思”的责任。思想是一种文化现象,思想是人类为应对环境挑战经由人的心智而产生的理念,思想一旦为人们信奉就会成为信仰,信仰会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价值导向,成为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比理念更伟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崇敬学问家,但更崇敬思想家。我真诚地希望读者能从本书中得到某种思想的启迪,希望读者指出本书的问题和不足,以便在修订再版时得到改正和完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的第二十章《儒家伦理应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何以可能》是我的博士生王新红完成的。

邵龙宝

2010年10月

目 录

总序

周家伦

自序

邵龙宝

上篇 儒学传统的基本精神

1 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传统	
——兼论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联姻与勾连	(3)
一、我们的文化传统的特性	(3)
二、“新”、“老”文化传统在冲突中联姻与勾连	(9)
三、在现实中反思和建构“活着的”传统	(11)
2 儒家人格理论的历史嬗变	(14)
一、元典儒家君子人格的核心：尊道而忘势	(14)
二、从圣贤崇拜到圣贤气象	(16)
三、从臣民的依附人格到公(国)民的自主人格	(20)
3 儒家人格理论的特性	(26)
一、现实性与虚拟性的矛盾与统一	(26)
二、中庸性与两面性的矛盾与统一	(29)
三、德性与智性的矛盾与张力	(32)
4 儒家文明何以能“长生”	(35)
一、儒学文明中断了吗	(35)
二、儒学文明的生命力	(38)
三、一个开放的文明体系	(44)
5 孔子人格理论的现代价值	(47)
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家风范	(47)
二、“仁民爱物”——既睿智又迂阔的政治家特质	(49)
三、力行救世传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哲学家气质	(51)
四、孔子人格理论的现代意蕴	(53)
6 孟子人格理论的风采	(59)
一、人皆可以为尧舜	(60)

二、善养浩然之气与大丈夫气概	(61)
三、民本王道思想与君臣关系	(62)
四、生活准则与修养理论	(64)
7 儒家伦理对当下中国人的影响	(66)
一、同情与敬意	(66)
二、隔阂与疏离	(69)
三、基因与血脉	(72)
四、目标、出路与启示	(74)
8 儒道互补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78)
一、儒道互补的源头与实质	(78)
二、儒道互补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影响	(79)
三、儒道的宗教特性	(81)
9 中国传统道德主要理念的现代诠释	(85)

中篇 中西交融的世界背景与儒学价值

10 中西方公民社会的历史嬗变及其文化传统之比较	(95)
一、古希腊时代公民社会的缘起	(95)
二、西方近代公民社会的思想嬗变及其发展	(97)
三、中西方公民社会及其文化传统之比较	(99)
四、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102)
11 中西方伦理价值观之比较	(105)
一、仁爱与博爱	(105)
二、整体与自我	(107)
三、责任与权利	(110)
四、结论与启示	(113)
12 中西方文明交融冲突中的儒学价值及其命运	(115)
一、儒学在中西方文明交融中的价值	(115)
二、儒学在中西方文明“冲突”中的“失语”状态	(121)
三、儒学传统的未来命运：对儒学传统的一种诠释	(125)
13 中西方思维模式和智慧之比较	(130)
一、中西思维模式与特点	(131)
二、道德理性与启蒙理性	(133)
三、生命智慧与知性智慧	(136)

14 儒家为人处世之道的正负社会功用辨析	(142)
一、“君子之道”和“处世之道”的两重性	(142)
二、“仁”、“义”、“智”、“信”核心范畴的内在蕴涵	(146)
三、结语	(152)
15 儒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	(154)
一、儒学中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资源	(154)
二、儒学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思想资源	(156)
三、儒学中人与自我和谐关系的思想资源	(159)
16 儒家伦理与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体系的构建	(163)
一、对儒家伦理的解构	(163)
二、构建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的方法论原则	(165)
三、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的构建	(167)

下篇 回归传统与儒学现代践行的路径研究

17 何以回归传统才能解决现实问题	(175)
一、回归传统是为了转换传统	(175)
二、回归传统是为了创新“活着的”传统	(176)
三、中国特色主要“特”在“文化传统”上	(177)
四、传统何以还有生命力	(178)
五、回归传统是为了走向未来和世界	(178)
18 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如何现代转换	(180)
一、困扰中国人 100 多年的世纪难题	(180)
二、从传统理念到现代践行	(181)
三、传统理念的现代转换：方法与途径	(186)
19 中国道德文化：从传统理念到现代践行如何可能	(192)
一、由对传统经典文献的诠释到对“活着的”传统的考察	(192)
二、注重制度建设和心性修养二者的统一	(194)
三、注重对治理、管理、法理、伦理、心理辩证关系的分析	(196)
四、从实然状态的描述到应然人格的建构	(197)
五、用现代信息技术做成领域本体在网上传播和完善成果	(198)
20 儒家道德应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何以可能	(202)
一、如何认识儒家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	(202)
二、儒家道德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何以可能？	(205)

	三、儒家道德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如何可能?	(207)
21	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与精神世界诉求	(210)
	一、信仰的内涵与本质	(210)
	二、信仰危机的原因	(212)
	三、精神世界的诉求	(216)
22	中国人的幸福观	(222)
	一、幸福的要素与实质	(222)
	二、古今中外思想家怎样看待幸福	(225)
	三、金钱财富与幸福的关系	(227)
	四、如何创造幸福的人生	(227)
23	青少年价值困惑及其教育路径研究	(234)
	一、成人世界的价值困惑	(234)
	二、青少年读经的意义及其路径研究	(238)
	三、人文素质教育让大学生走出价值困惑	(242)
24	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信仰教育内容体系建构	(248)
	一、中国人的信仰变迁之文化传统	(248)
	二、大学生的信仰现状之调查分析	(251)
	三、大学生信仰教育之内容体系构建	(254)
25	国学如何走向大众	(259)
	一、关于国学的内涵	(259)
	二、研究国学何为	(260)
	三、国学走向大众的方法和途径	(260)
26	传统伦理与和谐社会中国公民人格建构	(265)
	一、人格建构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命题和根本目标	(265)
	二、人格心性结构的五个维度之文化内涵	(268)
	三、传统伦理与公民人格建构的哲学思考	(269)
	四、人格建构的范例	(272)
27	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75)
	一、何谓中华文化	(275)
	二、传统文化需要转换	(276)
	三、中华文化何以远航	(276)
	四、拥抱“精神家园”	(277)
	五、我们应怎样仰望天空	(277)
28	分配正义与“主客相容为一”的治理理念	(281)